

#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研究

查明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020)

**摘要:**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文学可分为陷蕃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光复期文学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孤岛文学三个阶段。敦煌地区陷蕃以后,由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重新得到中原文学的补养,敦煌文学达到鼎盛;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阻断,没有中原文化文学的滋养,敦煌文学也慢慢走向衰落。在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僧起到维系传统、导夫先路和创作主力军的作用。

**关键词:**敦煌;文学;诗僧;中原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08)03-0107-05

无论在吐蕃占领时期,还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人都备受推崇与重视。吐蕃统治时期的僧人摩诃衍,归义军时代的数个都僧统,都曾参与到佛教以外的政治、外交、军事、州郡管理等事务中。尤其是归义军政权初创时期,僧人集团更是归义军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僧统、僧正之流,都具体参与到政权之中,甚至担负起出使中原、联络情感的使命。一般地,敦煌文人都自幼到佛寺所设的义学中接受文化教育。项楚认为,在吐蕃占领时期和以后的归义军时期,佛教具有了类似“国教”的地位<sup>[1]64</sup>。唯其如此,佛教及敦煌诗僧对敦煌文学发展的意义,自然不可忽视。

吐蕃进占敦煌以前,敦煌文学基本上是中原文学的追随者,地域特色尚不明显<sup>[2]</sup>。从敦煌文献所保存的诗歌情况来看,文人诗歌基本以初盛唐诗歌为主,而这些作品大部分为

流传到敦煌的中原文人之作品<sup>[1]62-63</sup>。陷蕃以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其中,诗僧在敦煌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而将敦煌文学打上深深的佛教烙印。

敦煌文献中的诗僧可以划分为三类:敦煌本地诗僧、外来诗僧和外地诗僧。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前两类。

## 一、陷蕃时期——沦陷区文学

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吐蕃军队沿河西走廊由东向西步步进逼,“使河西一带的唐朝文臣武将、高僧学徒步步西退,最后被围在敦煌城中”<sup>[3]267</sup>,最后于贞元三年(787)陷落。一部分陷蕃的文人,遁入佛门为僧。如平凉会盟时,被劫持的唐朝政府的使臣和大员,如崔汉衡、吕温等,被押至雪域之后,或老死于此,或遁入佛门为僧<sup>[4]</sup>。另有不少僧人是汉人的后代,

收稿日期:2007-08-21

作者简介:查明昊(1975-),男,安徽东至人,文学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佛教(诗僧)文学,敦煌学等。

指外地(主要为中原地区)游驻敦煌并生活了相当时间的诗僧。对于那些仅仅是路过(如西行求法诗僧)而在当地并没有什么活动的诗僧,则不在其内。

指仅有作品流传于敦煌,而本人并未涉足敦煌的诗僧。中原诗僧流传到敦煌的诗歌作品,对于我们认识敦煌当时的佛教思想及其渊源等,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不少研究者将之等同于敦煌本地的文学作品,则未免欠妥。

吐蕃占领沙州时间为781年,但吐蕃蚕食河西的时间则于安史之乱后唐廷无力西顾之时,“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前后起,吐蕃不断侵扰陇右诸州。”(颜廷亮《敦煌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页430)荣新江认为吐蕃占领沙州的时间为786年,但荣书此一时间当以陷敦煌城时间为准,而此前,吐蕃曾围城十年而未强攻,可见当时沙州的大部分地区应已落入吐蕃手中。(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期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页267)

河西诸州陷蕃时间分别为:凉州先后于天宝十年(753)、广德二年(764)两次陷蕃;甘州、肃州为大历元年(766);瓜州于大历十一年(776);沙州寿昌县为建中二年(782);沙州敦煌县为贞元二年(787)。据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陷蕃最晚的原因》,文载苏莹辉《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页7-23。

如被称作吴僧统、吴和尚的释洪辩,其父吴绪芝就是唐朝镇守边陲的军使,在敦煌陷落后,退隐当地<sup>[922-23]</sup>。这些陷蕃诗僧对故土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如泰法师《题金光[明]寺钟楼》:“独立悲乡思,登临望远天。树浓春色媚,山净野花鲜。檐下三光满,窗中万象悬。鸿钟吟掌内,楼观耸祇园。溪水流口口,孤峰戴夕烟。罕陪高此口,口口口口口。”<sup>[9447]</sup>从诗中所写景色来看,泰法师当为中原人,因故滞留敦煌。诗中时写眼前景,时写记忆中的故乡之景,抒发了对故乡的浓浓思恋之情。佚名僧《春日羁情》曰:“乡山临海岸,别业近天倪。地接龙堆北,川连雁塞西。童年方剝削,弱冠导群迷。儒释双披玩,声名独见跻。须缘随息请,今乃恨睽携。寂寂空愁坐,迟迟落日低。触槐常有志,折槛为无蹊。薄暮荒城外,依稀闻远鸡。”<sup>[9716-717]</sup>作者是一个世居安西、后定居敦煌的汉人<sup>[7]</sup>。前四句以写故乡遥远的地理位置,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五至八句是自叙生平,由“儒释双披玩,声名独见跻”可见,他是一位儒释兼通的名僧,故能担任敦煌小朝廷的使者。九至十二句则写拘留生活中“羁情”。最后四句,用“触槐”(用《国语·晋书五》春秋时晋国力士鉏麴未从晋灵公刺杀赵盾之命而触槐身亡的典故)、“折槛”(用《汉书·朱云传》中朱云谏杀奸臣张禹而汉成帝怒诛云,云攀殿折槛的典故),说明自己时刻准备着为国献身。《冬出敦煌郡人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夏日非所书情》诸诗<sup>[9705,710]</sup>,描写出使戎地途中的见闻,不难看出作者出使戎廷、被拘异域的悲苦心情,以及面对边塞地区的特异自然风貌而表现出来的缕缕愁思和无计还家的郁郁情结。

另一部分诗,则比较真实地描述了由于唐朝边防削弱,吐蕃等少数民族侵扰而带来的严重破坏现象。如佚名诗僧《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一至荒城恨转深,数朝长叹意难任。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时百草遍城阴。隳庸穷巷无人迹,独树孤坟有鸟吟。邂逅流移千里外,谁念栖(栖)惶一片心。”又《晚秋羁情》:“近来戎俗盈衢路,尚见蒿莱遍街陌。屋宇摧残无个存,犹是唐家旧踪迹。”<sup>[9711-712]</sup>

当时,不少文人不愿为异族所用,因而削发为僧。诗僧日进为吐占时期敦煌龙兴寺大德僧人,其《缺题》一诗曰:“玉颜思不见,闷坐叹文章。悉恨乡思照,更逢孤夜长。边庭衣口冷,忆口口中香。客语何以处,交儿口口口。”<sup>[9872]</sup>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原为流寓边庭的中原文人,后遁入空门。其《登灵岩寺》曰:“灵岳多奇势,兹山负圣图。谷中清溜响,峰际白云孤。石壁连霄汉,长松落涧枯。澄心香阁下,烦虑寂然无。”<sup>[9310]</sup>诗中所述之“烦恼”,除了羁留边庭的思乡之苦,更添了沦入异族统治的家国之痛。诗僧善来,吐占时期僧人,俗姓索氏,出家于敦煌开元寺,为释门法师,其《故李教授和尚赞附诗》曰:“夙植怀真智,髻年厌世华。不求朱紫贵,高谢帝王家。削发清尘境,披缁蹈海涯。苍生已度尽,寂嘿入莲花。”<sup>[9835]</sup>家园沦丧,使他们心灰意冷,因而削发为僧。

这两部分诗僧,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他们进入寺院,以僧人身份在寺学中教授传统的经史和中原腹地流行的文学作品,保存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使敦煌地区不因吐蕃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而成为吐蕃化地区。宁可指出,吐蕃占领敦煌以后,不少读书人遁入空门当了和尚,把他们的世俗学问带进了寺院,寺学成了兼授佛学和经史文章的新型寺院学校。寺学的教师大部分是僧人,他们在教学生们认字读书时,经常选择一些有关民族英雄的事迹或文章以及中原文化代表作作为教材,从而使中原文化得以延续<sup>[9]</sup>。德宗贞元十七年(801)释金霞坐化后,其弟子令狐像照等人痛哭不已,以致泪尽心血,哭音不衰,他们还分行守墓,尽孝子之道,令璆琳不胜感动和钦佩,于是赋《吊守墓弟子承恩诸孝子》一诗,劝慰诸人:“辮踣下头巾,荒迷不顾身。茹荼何足苦,衔蓼未为辛。两目惟流涕,双眉领伉颳。唯余林里鸟,朝夕助啼人。”<sup>[9817]</sup>描绘了孝子整日以泪洗目、哀守墓场的形象。

唐前期,中原崇文风尚也影响到了敦煌。敦煌文献中就存有两组敦煌诗僧间的唱和之作。

同题诗一:

流沙即夕有双贤,牧伯吾师应半千。法师契理青莲喻,多君瞻仰白牛前。韶光来照传灯座,春风往往送香烟。寮吏咸欢因骥尾,谁知今日遇弥天。(金髻)

良牧思弘化,吾师重契经。欲开三草喻,先列四花名。瑞色浮春日,和风引梵声。坐承方便理,咸得悟无生。(利济)

口口口口口,口高倚马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妙理光含秀,口口口口口。口中居上首,叶里坐青莲。(志贞)

良牧申三请,灵山涌法泉。觐(春)光寒尚在,溪柳怱含烟。诸子三车引,庭前驱马喧。故来闻奥义,从此悟心猿。(法舟)<sup>[9189-191]</sup>

此同题诗当为某次佛事法会所作。四诗均是赞主持这次法事的“牧伯”:利济诗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法舟从听众之多的角度来写,而金髻则叙议结合,同题而写法绝不雷同。可见诸位诗僧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

同题诗二:

义井生菡草,嘉口满一州。白花呈瑞色,绿水傍根流。露滴口茸润,霜飞叶带秋。暂来观洞里,恋此遂忘忧。(作者不详)

寒泉深数丈,忍草生半空。不近往来所,常居汲引中。青青纯一色,霏霏茂三冬。勿改天然绿,无窥桃李红。有时润甘露,晓夕闻香风。祇慕莲花德,非求兰蕙馨。詔根临定(宕)水,布叶垂龙宫。岂惮岩霜拂,依依向井桐。(作者不详)

玉井休微忍草生,金园祥瑞瑞花荣。诘旦浮云

璆琳,吐蕃占领前,任沙州法曹参军,吐蕃占领后,在敦煌报恩寺出家为僧,法名璆琳,人们尊称璆法师。他是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学问僧之一。此诗创作背景参屈直敏《敦煌高僧》,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页85-86。

千里盖,薄暮炎光一郡明。青藻孤标隐□池,白茅  
独口临水湄。三春绿色何□改,九月飞霜叶□□。

吾师徐步向云□。(金髻)<sup>[9657]</sup>

此组同题诗当为庆义并落成而作,写景手法之纯熟,非一般粗通文墨者所能为之。

从这两组同题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敦煌诗僧的创作,也曾出现过文人化的趋势,只是由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极力推行蕃化教育,大力推行佛教义理研究,从而阻断了敦煌诗僧的文人化进程。但敦煌诗僧对中原文化的归属感,却深植于他们的内心,并通过他们,深植于敦煌各族民众的内心,从而为后来张议潮率众起义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 二、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光复期文学

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率众起义,沙州、瓜州光复,不久,甘、肃二州亦光复,鄯、河、兰、岷、廓五州于大中三年(849)七月前次第光复,伊、西二州分别于大中四年(850)、大中五年(851)光复,凉州于咸通二年(861)光复<sup>[9]</sup>。在这一过程中,敦煌诗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议潮时期,敦煌佛教有三个来源:本地佛教、吐蕃佛教和中原佛教。归义军政权初期,由于敦煌僧尼人数占人口比重极大,一般百姓也都敬信空王,因此河西僧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最初的三位都僧统洪辨(任职时期851—862)、翟法荣(862—869)、悟真(869—895)都得到了唐朝的敕命,悟真还是辅佐张议潮起事的元勋功臣,因此都僧统具有与节度使分庭抗礼的地位<sup>[3263-276]</sup>。

我们从悟真的一生来看诗僧在敦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悟真(816—895)<sup>[1044]</sup>,俗姓唐,敦煌文书或称“唐僧统”、“唐和尚”等,“其先出自中土”,年15出家于敦煌灵图寺,20受具足戒为比丘。张议潮起义时,悟真“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后奉使朝京师,“诏入丹禁,面奉龙颜”,并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与两街大德及诸朝官有诗赠答。大中五年(856)四月廿二日敕授沙州都僧录。咸通三年(862)六月廿八日任河西副僧统,869年至895年任河西僧统<sup>[9232]</sup>。悟真儒释兼通,喜爱诗文,是敦煌归义军时期著名的文坛领袖<sup>[10146]</sup>。其文学作品,据统计,有遯真赞14篇、碑铭2篇、《上河西节度公德政及祥瑞兼十二时并序》(歌辞今已不存,仅存其序)、《四兽恩义颂》1首、《唐和尚百岁书》、五七言诗12首、功德文2篇等<sup>[11]</sup>。

悟真生平重要的事迹之一就是入京献款,其时间荣新江

认为在大中五年(851)五月<sup>[36]</sup>,而项楚认为是大中二年(848)<sup>[1155]</sup>,苏莹辉亦持后说。悟真所作之《张淮深碑》载大中二年,张议潮曾遣高进达等赴京献捷,而未记自己入朝一事。然《张淮深碑》中对大中五年自己入京及同年张议潭入京一事,也未记载。这与其后来的诗文中屡屡提起入京面圣受赐一事似乎矛盾。但我们知道,大中五年随着归义军政权逐渐壮大,唐王朝对归义军的戒备心也越来越重。而同年五月悟真先于张议潭入京,当负有缓和归义军政权和唐王朝矛盾之责任。虽然悟真在长安得到了宣宗的接见,并受到了极高的礼待,悟真在自己的活动中,极力营造一个归义军政权对唐王朝忠心耿耿的印象。但两个月后,张议潭还是被迫入朝一事,证明悟真努力并未能完全达成目的,所以悟真未提自己入京的确切时间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能的推测是,悟真大中二年、大中五年先后两次奔赴长安。

### (一) 入京之作

悟真入京与京城诗僧的酬答之作中有关悟真的告身4件,其序云:“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累在军营所立功勋,题之于后。”<sup>[1329]</sup>据此可知,《悟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为大中五年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后,悟真第二次奉使赴京都表奏朝廷时,与京都各寺大德及朝廷官员酬赠的一组诗,其中有悟真诗2首,各寺大德诗13首,朝廷官员诗1首。这一组诗除栖白《奉赠河西真法师》1首外,其余15首诗均不见载于《全唐诗》的佚诗。

悟真《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曰:“生居狐□地,长在碛边城。未能学吐凤,徒事聚飞萤。”<sup>[9333]</sup>“吐凤”、“聚萤”分别用了汉扬雄著《太玄经》、晋车胤囊萤夜读的典故,诗中用“吐凤”称赞擅长写作,用“聚萤”谓自己尚在苦读学习阶段,且亦以萤光弱,作为自谦。悟真此诗可以看出:1.敦煌僧对唐王朝(帝京)的向往及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其诗中把自己所出生长大的敦煌称作“狐□地”、“碛边城”,虽不免有一定的自谦成分,但更多还是其内心的真实感受。2.对儒家文化有一定的研习,诗中用典,无疑证明了这点。

另一首《悟真辄成韵句》曰:“敦煌昔日旧时人,虏醜隔绝不复亲。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春景氛□乾坤泰,启煌披缕无献陈。礼则宛然无改处,艺业得传化塞邻。羌山虽长思东望,蕃浑自息不动尘。迢迢远至归帝阙,口口听教好博闻。莫辞往返来投日,得睹京华荷圣君。”悟真称吐蕃为

参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中洪誓碑文,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74。

苏莹辉《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一文,认为张议潮先后三次派使者入朝献款,第一次是高进达等于大中二年(848)自沙州出发,绕道东北之天德城以往长安,因旅途耽擱,至大中四年(850)以前抵长安;第二次是释悟真等与吴正安等二十九人于大中三年(849)七月以前,同时或先后由沙州出发,仍取道天德城,转往长安,于同年秋、冬间抵达长安;第三次是张议潭、李明达等于大中五年(851)秋,由沙州出发,经肃、甘诸州东南行,以往长安,于同年十月抵长安。文见苏莹辉《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页143-154。据徐俊《敦煌诗歌残卷辑考》考证,《张淮深碑》即《张公德政碑》,页171。据荣新江考证,《张公德政碑》为悟真所作,参其《敦煌写本 敕河西李度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校考》,见《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06-216。

项楚则认为此诗为别人赠悟真之作(《敦煌诗歌导论》页156)。余以为徐俊之说更为恰当(《敦煌诗歌残卷辑考》页339)。

“虜醜”，而把入京献款称为“归帝阙”，从中也可看出敦煌僧俗对唐王朝的认同，“羌山虽长思东望”言敦煌虽与京城路途遥远，然而却不能阻隔人们对长安的认同。

从当时京城诗僧的酬赠之诗作来看，他们赞扬悟真的德行和诗才，如“谭论妙闲金粟教，诗情风雅逸才篇”（道钧诗）、“经论三乘鹜子论，诗吟五字惠休才”（景导诗）、“词华推耀（翹）颖，经论许纵横”（有孚诗）<sup>[9337-338]</sup>，但更肯定悟真献款之义举，“表达了长安僧众对瓜沙十一州重返唐朝版图的喜悦心情，以及中原人士和西陲边民共同的统一意识”<sup>[1156]</sup>。

在封建时代，能够面睹圣颜，是一件极为难得和备感光荣之事，对于像悟真这样偏处敦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悟真用自己手中的笔，写下了雄壮的宫殿和见到帝王时的激动心情。《缺题四首》其中的两首：

重云缭绕拱丹青，圣上临轩问百寮。龙沙没落何年岁，牋疏犹言忆本朝。

表奏明君入紫微，便交西使诏书进。初霏圣泽愁肠散，不对天颜誓不归。

又《缺题》：

三五年来复圣唐，去年新赐紫罗裳。千华坐（座）上宣佛教，万岁楼前赞我皇。谈始（士）休夸登御昔（席），道门虚设坐龙床。圣众莫羨灵山会，只是眉间未放光<sup>[9340, 764-765]</sup>。

这三首诗，论者多据诗中所述事迹推其为悟真所作，姑从之。诗中抒发了作者对入京朝圣的决绝之心与朝圣之后的自矜心态（这一点第三首体现更为明显），由其自编受牋集的行为，也可为明证<sup>[9329-332]</sup>。

#### （二）在敦煌之作

《奉酬判官》：“姑臧重别到龙堆，屡瞰星河转四迴。十里獬戎多狡猾，九垄山河柱柱来。幸沐尧风威化披，征骑稀踪渐以开。结约阊梨（下残）”<sup>[9342]</sup>此诗构思恢弘，格调高昂，洋溢着河西回归的喜悦、自豪之情。

#### （三）《百岁篇》

敕授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思忆一生所作，有为实事，难竟竞寸阴，无为理中，功行缺少，独被习气，系在轮回，自责身心，裁诗十首。虽非佳妙，狂简斐然，散虑摅怀，暂（暂）时解闷，鉴识君子，矜勿谓焉。

幼龄割爱预投真，未报慈颜乳哺恩。子欲养而亲不待，孝亏终始一生身。

从师陶染向空门，惟忻温故乐知新。冰谨专行入正路，犹恐辜负一生身。

迷情颠倒起贪嗔，还曾自赞毁他人。口过闲谈轻小罪，如今追悔一生身。

丰衣足食固辞贫，得千望万费心神。徒劳蓄役

为他有，呼嗟役至一生身。

情埃往往显名闻，奢心数数往来亲。衣著绮罗贪锦绣，矜装坏器一生身。

盛年耽读骋风云，披检车书要略文。学缀五言题四句，务存遍计一生身。

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至立一生身。

绍继传灯转法轮，三车引驾詘迷津。智海常流功德水，希须浮泛一生身。

圆明正觉觉无尘，罪根福性性齐均。参罗动植皆非相，无过返照一生身。

岁有荣枯秋复春，千般老病苦相奔。从兹更奚回顾恋，好去千万一生身<sup>[9155-158]</sup>。

此篇叙事性较强，间有议论，带有回忆录的性质。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悟真诗中除了宣扬佛教的义理外，尚肯定了对父母的“孝”（第一首）和为国尽“忠”（第五首）。而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在敦煌僧诗中是最为普遍的主题。

从悟真所保留的诗作，结合他的生平、地位，可见酬赠之作当占有相当的比例。悟真的诗不长于描写，而长于叙述。

法荣是悟真前任河西管内都僧统，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其几首诗作：

相送至河良（梁），相思殊未央。山头日杳杳，漳底水飏飏。蒲生半池绿，花发一园香。交横无数酒，若个是离觞。（《春日相饯一首》）

鸟来鸟转使，岁来岁非遥。回（面）上红颜色，头中白发饶。人生日复日，怀愁朝复朝。百年凡几夜，三万六千霄（宵）。（《五言》）

天地心间净，日月眼[中]明。仁作千年贵，金银（银）一代荣。（《缺题》）

将军定边计，出（下缺）（《五言诗一首》）<sup>[925]</sup>前两首诗，明显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春日相饯一首》一诗，音乐感较强，读来朗朗上口。首句点明送别地点。二、三句写景，且紧扣题中“春”字。最后一句借饮酒写离别之难舍难分，而无一字提及离别。《五言》一诗感叹时间易逝。《缺题》诗宣扬“仁”的思想，“仁”可“千年贵”，而“金银”却不能持久。《五言诗一首》当为赞归义军政权的领袖而作。

从这一时期的诗作来看，诗僧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与儒学修养，他们的作品中宗教色彩较淡，而儒学色彩较浓。他们积极地参与归义军政权的活动，为河西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几乎参加了归义军政权的各个政治生活层面，甚至于涉足官学，如杜牧《敦煌都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一文记慧苑曾为敦煌州学教师<sup>[12]</sup>。

#### 三、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孤岛文学

曹议金于914年取代张承奉担任节度使，开创曹氏归义军时代。他们对佛教事业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开窟造像，抄经

施舍上。曹氏政权下的佛教,虽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此时敦煌佛教社会与张氏政权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庶民佛教的发展<sup>[3276-279]</sup>。这一时期,佛教地位下降,佛教首领成为释吏。故此时的诗僧之作多为随从节度使的应和之作。如道真,俗姓张,出家于沙州三界寺。后汉乾祐元年(948)为三界寺观音院主,重修莫高窟南大像北一所石窟,次年竣工,赋诗纪之。三年(950)任沙州释门僧政,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巡礼莫高窟,又赋七言诗题壁纪事,诗曰:“三危山内□世贤,结此道场下停闲。侍送门人往不绝,圣是山谷水未宽。一句之内僧入住,感动山神赐霜树。□值牟尼威力重,此山本□住□(僧)□(用)。”<sup>[57]</sup>完全是词语的堆砌,全无诗味。

灵俊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另一位著名僧人,他俗姓张,出家于敦煌灵图寺。金山国时任沙州释门都法律、福田判官、曹议金时任都僧政加紫绶,约卒于后晋时,年六十三。他存有《缺题》诗一首:“灵俊言出永着实,好个儿郎不须夸。好个儿郎莫求人,言语出来句句真。”<sup>[923]</sup>这首诗语言直白俚俗,告诉人们要讲真话,不能自夸。

从现存的诗作来看,后期诗僧诗歌中的宗教色彩逐渐加浓,通俗性加强,而诗歌的文学性则明显地下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敦煌地区战争不断,归义军政权生存越来越困难,佛教地位不断下降,再加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困难,缺少了来自中原汉文学的滋养,曾经艳丽一时的敦煌诗僧文学之花,也就渐渐枯萎了。

[责任编辑 马艳]

## 参考文献:

- [1] 项楚.敦煌诗歌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
- [2] 陈兵,李子伟.陇右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01.
- [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期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4] 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105- 106.
- [5] 屈直敏.敦煌高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 [6] 徐俊.敦煌诗歌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A].敦煌吐蕃学论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7.
- [8] 宁可,敖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77- 78.
- [9] 苏莹辉.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A].敦煌论集续编[C].台北:学生书局,1973: 7- 23.
- [10] 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 [11] 颜廷亮.敦煌文化[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320.
- [12]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七五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770- 7771.

## A Research of Monk Poets in Dunhuang in the Tang Dynasty

ZHA Ming-hao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Dunhua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s Dunhuang was occupied by Tubo, and the contact between Tang and Dunhuang was cut off, the literati of Dunhuang was forced to develop their own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the literature of Dunhuang had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cond period, the contact between Tang and Dunhuang recovered, and the literature of Dunhuang was in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In the period of Cao's regime, the contact between Tang and Dunhuang was cut off again. Without the nourishment from Central Plains, the literature of Dunhuang fell into declin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Dunhuang, the Dunhuang monk poets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s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y also found new road to develop Dunhuang's literature, and were the main force in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 Dunhuang; literature; monk poets; entral Plains

其实,佛教地位的下降在悟真任职的后期就已经显现。悟真统治晚期,由于其“耳顺从心,色力俄衰”,都僧统对于敦煌教团的统治能力必然转弱。到了张淮深统治末期,敦煌佛教教学方面迅速衰落,而且相对于世俗政权来讲,佛教教团的力量也在减弱。到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政权已完全凌驾于教权之上,都僧统自称为节度使手下的“释吏”(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期敦煌历史考索》页269-276)。